

经济学家的公司

[美]

查尔斯·K·威尔伯 肯尼思·P·詹姆斯 著
范恒山 郑红亮 译

THE
COMPANY
BY
ECONOMISTS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经济学的贫困

[美] 查尔斯·K·威尔伯 著
肯尼思·P·詹姆森

范恒山 郑红亮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3·北京

(京)新登字 211 号

Charles K. Wilber and Kemeth P. Jame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根据圣母玛利亚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译出

经济学的贫困

Jinjixue De PinKun

〔美〕查尔斯·K·威尔伯著

范恒山 郑红亮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74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3 000

ISBN7-5638-0393-9/F · 223

定价：8.20 元



中文版序

本书考察了处于变动着的世界经济之中的美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对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若干思路不同的重要经济理论和政策作出了评论。

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性正在使世界经济大范围地走向趋同。在这里，技术的、经济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人的选择将决定最终的结果。中国的政策变化正是与这些国际性趋势相适应的；并且，随着其经济对市场依赖性的增强，当今美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将日益突出。基于此，我们相信本书会引起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的兴趣，因为他们正致力于完成经济转轨的任务；同时，我们也希望本书能有益于他们寻找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经济转换方式，而不受书中所概述的某种经济理论的支配。

我们是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开始本书的写作工作的。里根及其经济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一直统治着美国的整个80年代。但是，我们并没能在他的遗产中寻找到多少宽慰，这一点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在这些领域，先前几十年曾经取得的成果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既具有创新力，也具有破坏力。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里根执政只不过是原有进程的某种中断。现在我们已开始对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并有新的意愿承认贫困也是个问题，尽管处理这些现实问题的新的承诺还未出现。曾经为里根主义者们取得巨大财富提供了手段的军工企业，在东欧变革的背景下已经走向衰落，虽然争夺和平果实的竞争才刚刚开始。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需要改变事态的进程，并开始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像80年代所做的那样，回避这些问题，忽视它们，或寄希望于它们有朝一日会“自然消失”。

里根的变革的确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某些重大的、积极的变化。现今人们已不很愿意单纯依赖政府来纠正经济的问题了，并且看待政府的具体政策也开始习以为常地采取了更带批评性的眼光。不过，不幸的是这一点已为另外的一种倾向所代替，这就是不加批评地承认私人部门具有解决全部经济问题的能力。这种对私人部门的天真信任的错误所在，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上述这些变化使我们相信，当今美国的经济问题，如生产率的低速增长，巨额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陷入贫困的下层民众的增加，如此等等，只有从经济的制度演变以及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经济运行的历史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对市场体制的历史考察显示，在生产大量的，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产品和劳务方面，市场体制是成功的；但是，它产生这种作用时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市场体制使北美和南美都得到了发展，但前者远比后者发展得快。某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发展的动力中心，另一些则在外围发生停滞。而后，这一过程出现转换，曾经较快增长的区域变得停滞，曾经停滞的又开始发展。并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也确实是经历着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交替。这种过程还会波及单个的产业乃至单个的家庭。诸如此类的不平衡都是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指出了这种动态过程的积极方面，他所使用的概念叫做“创新性的破坏”：“使资本主义这架机器不断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以及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发展）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变革，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并创立新的结构。这种‘创新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

这个“基本事实”对失业的熟练工人来说并非是一种安慰，对一度繁荣但现已衰落的城镇来说也是如此。因此，经济体制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它自身的弱点所在。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可能会是有帮助的。90年代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什么要这样呢？必须知道美国的经济是很具有生产性的，可以说比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生产性。但是，假如另一个国家变得更具生产性，则相比之下美国就会变得缺乏竞争力。反过来，假如美国而后又变得更具生产性，则其他国家便会减弱竞争力。

现在的问题是，竞争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受害者，即那些被挤出竞争队伍的人。这既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被破坏的过程。从长期看，它创造出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财富，尽管这种增长并不平衡；从短期看，它又会摧毁企业，破坏就业机会和社区共同体。

当然，社会总是试图使这些经济的力量服从于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寓于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制度之中。在过去的60年中，民众已经将缓解经济力量的破坏性一面的任务更多地移交给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政府。在美国，重大的经济争论热点已经是并且还将是：在尽可能不损害市场成长的创新性一面的同时，怎样才能够使其破坏性的一面得到减轻？

如果历史上的这些教训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不难看到，80年代的美国乃至全世界，某种试图将经济改变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模式的激进做法是无益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尝试着从历史中学习，并且自认为已经对历史的这些教训进行了恰当的分析，进而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方案。

我们希望，重新认识现实，并下决心激励、促进和推动经济去为人类服务，这将是里根政府颇具特色的“适度忽视人性因素”政策所留下来的最重要遗产。而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查尔斯·K·威尔伯
肯尼思·P·詹姆森

1992年8月

前　　言

我们希望写出较为成熟与完美的作品，因此，这本书在问世之前经过了很长的酝酿阶段。1976年我们开始初步的准备工作，1978年写出初稿，1981年夏着手修改定型，直到1982年夏才完成了最后的定稿工作。

尽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此书的出版日期已经逼近。看来，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比我们当初的预想更为重要：只有以美国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家们力图理解和解释经济的历史为背景，才能理解当代美国的经济问题。人们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教训，即轻率而意促地进行改革，以求经济进入某种不同于过去的理想境界，最终是无益的和破坏性的。

我们一直试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并且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发展了一种分析方法和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与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极为一致的。

我们希望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客观的而没有矫柔造作之嫌。当然，我们承认，某些价值观念在调查研究中无疑会影响对所提问题和所考虑因素的选择。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应当是人的目标的仆人，而不是人的目标的主人。而且，我们认为这些目标包括生存资料的供给、尊重和友谊以及自由。最后，对经济的评价应当根据它在完成这些目标方面所起的作用来作出。根据这样一些观点，读者便可以对本书研究中所达到的客观性程度作出判断。

多年来，许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从而大大提高了最后修改稿的质量。詹姆斯·韦弗及时审阅了每次的修改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进行本书最后的全面修改之前，我们得到

了其他许多人的帮助。他们的远见卓识及其令人鼓舞的意见对最后定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和读者们应该感谢他们：圣母玛利亚大学的弗兰克·博内罗和吉姆·莱克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鲍勃·凯勒以及厄尔汉姆学院的霍华德·理查德夫妇；我们要感谢汤姆·斯沃茨，他较早地参与工作，与我们合写，第10章。

我们的许多学生，通过完成课堂作业或直接参与个别章节的一些工作的方式给予了帮助。特别应提到的是：玛丽·伯克曼和罗兰德·霍斯伯根参加了全部手稿的写作、整理等工作；马克·麦卡斯在第5章的写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彼得·苏尼文帮助起草了第6章；鲍勃·哈里森对写第7章和第8章作出了努力。

性情温和的特利·克普莱斯基曾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定稿工作中，她对文字的加工润色有着精湛的技巧，且速度超凡，因而这一令人生厌的任务就落到了她的肩上，为此，我们谨表诚挚的谢意。

最后应指出的是，与圣母玛利亚大学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及该社负责人吉姆·圣格福德合作是令人愉快的。感谢他对此项研究课题的关心与支持，感谢他在这一工作中提出的诸多建议。

译 者 的 话

对我国读者来说，查尔斯·K·威尔伯和肯尼思·P·詹姆森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可能还比较陌生，但是当您读完由他们合著的《经济学的贫困》一书时，相信会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据译者所知，他们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包括与他人合著的）：《现代经济史的重新考察：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1974年）、《地球是上帝的：托管人职责文集》（1977年）、《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78年）、《经济发展的方向》（1979年）、《供给学派经济学：增长与收入分配》（1980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1981年）、《一种新的趋同：美国的拉丁美洲化？》（1982年）等。

当然，在上面这些著述中，《经济学的贫困》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作，也是他们合作成功的典范。他们俩人都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圣母玛利亚大学任职，威尔伯教授是该校经济学系主任，詹姆森则是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现已转犹他州立大学执教）。在《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他们重新检验了18世纪中期以来至今广泛受人注意的各种经济思想的经历，系统地阐述了它们如何崛起、如何陷入困境和如何为新的经济学思潮所代替等问题。但是，作者并非为阐述历史而阐述历史，而是紧扣美国现实经济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经济学如何显得无能为力这一主题。作者强调指出，当代美国经济问题只有以美国经济的制度发展以及经济学家们力图阐释的经济的整个历史为背景方能理解。可以说，这是全书的基本出发点。

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陈述了美国经济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主要发展线索，着重指出了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为下面的全面分析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第

二部分概述了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四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即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凯恩斯主义、周期波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同时阐释了它们各自对现实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并作出了自己的评论；第三部分以各种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著作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将凯恩斯主义和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理论之长处综合到自己理论中去的新方法——作者将这种综合称为“后凯恩斯制度主义”，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了美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发生故障的原因，以及怎样才能使其运转得较好的思路；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对当代市场机制更现实的估价基础上的经济改革纲领。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全书之前能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

一、美国经济的“敦刻尔克”和经济学家的困惑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在 30 年代就提供了使资本主义免遭因大危机袭击而彻底崩溃的药方，并且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上也出现了 60 年代那样的“黄金时代”，但是作者认为，正面的裂痕实际上在 1965 年就已开始出现，1968 年又在扩大，到 1973—1975 年就产生了自 30 年代以来的最长久、最深远的衰退和危机，最后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滞胀之中。这样，整个凯恩斯主义理论受到了广泛失业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同时并存的现实的冲击。在某些年份，虽然也出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但这是以失业的增加为代价的；当失业下降时，价格又以加速度上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济！但是，究竟如何准确地评价它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

1. 评价经济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

当今的世界有各种类型的经济，如何评价它们的成功与否呢？

作者认为，只能根据它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来确定。“我们经常听到‘效率’是经济的最高目标的说法，但实际上只有当效率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时，这一说法才能成立。否则，效率会成为一种妖术，其魔力可能使经济误入歧途。”这是因为“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本身不应临架于人民的目标之上，而应是达到目标的有用工具。”

所谓人民要求的目标指什么呢？作者认为包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尊重和友爱、自由和机会均等这样三个方面。这是作者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说，再结合经济目标而提出来的。作者认为，这里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即生存需要，与马斯洛说的生理需要是基本一致的，它包括充足的食物、水、住房、穿着、教育和保健。一个成功的经济将能满足这些需要，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稳定则会影响它们的满足。所谓尊重和友爱，指的是公民间的公平关系。作者认为，给大多数人以最少的收入而给少数人或少数家庭以巨额财富的社会不可能提供尊重和友爱；公平不必然意味着平等，但意味着有某种舆论关心财富和收入的公平分配。至于自由和机会均等，作者指出，它不意味着每个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完全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但自由的增加意味着个人或群体的选择系列在增加，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如消费选择、职业选择和政治选择（参与决策）等。作者强调指出，上述这些目标的认可和存在，是我们各种检验经济以及用以处理我们当前经济危机的可能政策选择的方法论核心，经济评价应该按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来进行。

2. 美国经济是否合乎上述标准

伴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处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也身处荣耀的顶峰。到60年代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政策可以调整经济而实现任何目标；政府只需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辅之以认真听取经济顾问的建议，便

可轻而易举、成功地确保经济在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但是，作者指出，这种信念很快就被 70 年代开始出现的经济滞胀所动摇，特别是到了 80 年代初，失业率上升到 30 年代大萧条后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任何减轻失业的措施又都会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又会引起新的经济衰退，这种背离“常规”的无休止循环使经济学家们普遍感到困惑不解。

美国经济中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这种两难局面究竟产生哪些后果呢？作者指出，首先是使许多人的生存需要受到威胁，因为尽管 60 年代政府曾预言贫困将在十几年内消失殆尽，但实际上由于 70 年代的经济衰退而使贫困面重新扩大。其次是自尊和友爱受到下列方式的冲击：城市及公共服务因削减公共开支而加速衰败；犯罪率在上升，但却不得不解雇大批警察；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外国企业（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的企业）竟然击败了美国的主要工业——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等，美元开始不断贬值；等等。最后是人民感觉到自由正在被消弱，因为政府为控制正趋恶化的经济系统而在税收、支出和调节等各方面增加了动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许多人称之为“危机”状态，它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地脆弱，各种武器都已失灵，我们处在了经济和社会即将瓦解的边缘。里根政府的官员们形象化地称之为“经济的敦刻尔克”。

为更现实地把握美国经济既有的成就和当前的问题，作者接着细致地考察了美国衡量宏观经济成就的四个传统尺度，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变化状况跟上述三大经济目标的实现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3. 经济学家们怎样作出反应

一种可能的政策反应是顺其自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是，西方经济已经进入秋季，一个持续的高失业和不稳定增长时期将

会出现，这是工业发展成熟的自然产物。另一种对经济抱乐观态度的反应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它声称全球经济“只要小心行事便会充满希望”，因为“过去十多年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一连串异常的、重复率小的不幸事件的干扰及一些可以避免的政策上的失误。”因此，他们幻想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弊病会简单地消失。

针对上述这两种倾向，作者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首先，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抛弃构成我们经济特征的那些经济目标。……没有理由简单地放弃所有创造性的努力——只要它们有助于认识经济、改善政策以实现预期的目标。”“类似地，我们也不同意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报告。我们不能简单地避而不谈 70 年代的经济。”接着，作者尖锐地指出，除非我们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建议，否则，我们将实际上不得不接受萨缪尔森所讲的“秋季”经济。

二、对传统的和现代的经济理论的反省

在美国经济中，危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学至今对此仍是无能为力。经济学家们应该说有足够的空间去研究、反思，直至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弄清，但为什么他们又没能告诉我们怎样摆脱 70 和 80 年代的严重困境呢？作者认为，简单的答案就在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曾一度相信问题大多已经解决，这一点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1. 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衰落

直到 30 年代中期，多数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市场经济会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认为只要参与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及投入品通过市场的买或卖，经济就会有效地运行，因而他们极力主张自由放任政策。正因为这样，当 30 年代大萧条出现时，这些经济学

家要么在等待自由市场调节的奇迹重新出现，要么就觉得不知所措。结果是，自由放任经济学实际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是什么使整整统治了 50 年的自由放任经济学黯然失色的呢？作者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萧条，它使有关贫穷原因的社会哲学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声明落空了。作者还认为，自由放任经济学显然也不能解释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四大问题，即垄断、外部性、机会不均等和失业，这无疑都使它失去了原先那样的吸引力。

2. 凯恩斯主义教义的终结

当古典的和新古典的分析都没能对萧条及上述四大问题提供可接受的答案时，理论的真空就出现了。但是紧接着，在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过程中，一种以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著作为基础的新的分析方法和政策体系开始形成。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极富贡献地提出了两个一直到 70 年代都还渗透于新主流经济分析中的关键论点：首先，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其次，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稀缺资源配置手段发生作用。这后一点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分析的基础。在 30 年代，当政者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支持可能还是尝试性的，但后来几十年中凯恩斯主义方法的无可争议地得到加强，甚至使作为共和党自由放任政策继承者的理查德·尼克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但是，好景不长，美国经济的地平线上很快就出现了阴云，而凯恩斯主义者们对此却缺乏理论的准备。作者指出，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们更多地在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行方面发掘，对某些其他领域就几乎完全没有顾及，其中首要的就是供给方面。由于他们一直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需求方面，与长期供给决策和刺激效应有关的许多问题就大量地遗留着没有被考察。第二个主要的疏漏则在价格制度方面，他们一般只将价格问题作为需求分析的辅助部

分，以为需求过高时，价格会趋于上升，从而失业会格外地低。但是事实上，早在 1958 年时菲利浦斯就已发现，低的失业率一般总是跟高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它意味着用限制总需求来反对通货膨胀将造成失业，甚至可能引致一次衰退，因而或者是更高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更高的失业——两者都是非常不愉快的。作者认为，这一交替关系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即现实经济并不反映构成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完全竞争模型；经济的很大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垄断的力量，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并非是高度流动的，加之其他方面的不可变异性，都使市场制度的调节机制变得呆滞不灵。总之，美国经济的现实已经从 60 年代如 5% 的失业率对 3% 的通货膨胀率，或 3.5% 的失业率对 5% 的通货膨胀率那样的良性替代，变成了 70、80 年代如 12% 的通货膨胀率对 7% 的失业率，或 8% 的通货膨胀率对 9% 的失业率这样一种或者自杀，或者被处死的很不惬意的选择了！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其理论毕竟是大萧条的产儿，它的魅力正在消失，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者正在赢得论争的优势！这迫使凯恩斯主义者们采取更保守的立场，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呼吁政府减少调节，呼吁利用市场刺激的政府计划和一个较少干预主义的财政政策。正因为这样，里根总统周围的经济顾问们也正倾心于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理论。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事实，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3. 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理论正确吗

70 年代以后开始崛起的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理论认为，政府作用的增加和通货的膨胀是威胁经济福利和个人自由的两大祸根；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衰退，过分的宏观管理和社会保障会形成官僚主义，从而导致无效率，失去对私人部门的刺激。因而，唯一的办法是削减社会福利，接受短期的失业以医治通货膨胀。所以，他们的理论纲领的核心是对自由市场的回复，主张有限的政

府行动和强有力个人主义的刺激。

但是，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者的理论正确吗？作者尖锐地指出，尽管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理论已由里根政府付之应用，但它能否解决经济危机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三：首先，它缺乏作为分析基础的经验证据；其次，它有自身的内在矛盾；最后，它不加鉴别地信赖私人企业的效率，过于盲目。在谈到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者所提出的实际经济政策时，作者进一步指出，“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者不仅错误地理解了经济问题，而且提供了一套不像会有什么好效果的政策。”

4. 周期波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一般说来，各种经济理论体系都蕴涵着一种假定，这就是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完善经济的运行。但是，作者认为这也并不尽然。他们说，比如周期波动理论，指出了经济过程是由不可操纵的因素决定的，但它实际上很少提出有关对付周期波动之步骤的建议，它只是消极地要我们等待下一周期经济发展上浮阶段的到来。这无疑降低了该理论应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的用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论，来解释商业循环和周期发生的经济社会危机的经济理论家群体。但是作者不无遗憾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指出可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现存经济的弊病，但它是如此地激进，以致不得不对社会作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必然威胁到经济中现存重要力量的生存，所以它实际上不可能作为一部分自觉的政策来贯彻。

三、可供选择的理论：后凯恩斯制度主义

在作者看来，不论是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和主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还是长期波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似乎都于事无补！就前两者来说，它们无法解决美国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无数问题；就

长波理论来说，它既没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准则，也没能明确指出经济实际处在周期的那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虽提供了理解目前危机和未来方向的有用的观察方法，但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美国的情况太不相宜，很难成为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以，必须开拓新的理论领域。

1. 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基本方法

作者把自己所开拓、综合的理论称作“后凯恩斯制度主义”，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与凯恩斯主义、保守的经济个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我们所以起这一名称，是因为它渊源于凯恩斯和美国的制度主义者。”

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是先观察世界，而后再理论化。以此为基本框架，作者进一步阐释说，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者一般地是从给定的情况出发来解释现存制度和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的，比如，是什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是什么激励着人们去做各种事情？社会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和谁有力量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并进而影响现存的结构？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者正是希望通过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来逐渐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方式的。也正因为这样，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全面、系统和不僵化：之所以全面，是因为它注重部分和整体间的关系范式；之所以系统，是因为它相信那些部分会组成连贯的整体，且只有从整体意义上才可能理解；之所以不僵化，是因为它将关系范式上的变化视为社会现实的真正本质！

后凯恩斯制度主义的先驱人物是 A·艾奇纳。他曾认为，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研究如何分配稀有的资源，而是研究一个经济体系如何通过生产和分配社会剩余来不断增加产量；在体系的这一意义上对经济理论效力的严峻考验是某些行动（或政策）是否会产生成预期的结果。作者指出，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者是否有机会用这种方法检验他们的理论，这是一个有待时间作出回答的问题。